

DUKU

读库

1105



DUKU1105

威廉·莫里斯 绘

编号: 1105

DUKU1105
2011.1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库1105/张立宪主编.—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5133-0438-2

I.读… II.张…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IV.①I217-61

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核字(2011)第224027号

读库1105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88310888

传真:010-8831089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010-83398809

官方网站:www.duku.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

印刷: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645×925 1/16

印张:20

版次:2011年11月第一版 2011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33-0438-2

定价:30.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DUKU1105 · 目录 ·

01-96	三线人	罗 尘
97-129	共产主义大楼	文：林 衍 摄：商华鸽 张嘉妍
130-157	过去的小学	傅国涌
158-189	儿童房里的启蒙运动	寇杜拉·比绍夫
190-215	王石凹	沈伟东
217-226	我们有足够的葵花子	桑格格
227-238	只是欢喜随意而至	柴 静
239-259	线索	张家荣
260-295	怕流水年华春去渺	树 眼
296-317	齐国往事	刘 勃

三线人

罗 尘

他们是来自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三线人。四百万知识分子、技术骨干，以及随后衍生出的数千万三线后代，他们在崇山峻岭之间构筑了至少两代人的生活。

行走江湖，时常被人问到：你是哪里人？

中国人喜欢问这种问题。既不是什么礼貌，也不是无聊。从地域名称背后——我们以为自己大概可以触摸到对方的生长轨迹，或是性格脉络。这理应是一种简略有效的方式。

然而有一种人，你在问他这个问题时，他会比较困惑，抓耳挠腮，不知如何作答。这是他认真时的表现。在问得多以后，他会随便答一个名称，再加上几句蹩脚的当地土话，以此来证明。而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些无根的人。他们很难形容自己的故乡，也很难准确地将自己与某座城市产生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他们来自于一个城市不是城市、乡村不是乡村的所在。他们曾拥有自己的学校，自己的银行，自己的礼堂，自己的社会，似乎除了火葬场之外，应有尽有。

听上去，他们仿佛在世界之外长大，像是《桃花源记》里的什么。

他们所存在的地方通常都有一个代号，或者是385信箱，或者是406信箱。他们的周围通常都是山，以及广袤的农村。他们在蛮荒之地拉小提琴，在不为人所知的地带唱俄语歌曲，并将视线牢牢地锁定在大山之外，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是肩负崇高使命而来到这里的。

他们是来自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三线人。四百万知识分子、技术骨干，以及随后衍生出的数千万三线后代，他们在崇山峻岭之间构筑了至少两代人的生活。长期以来，他们沉默不语，他们的世界便不为人所知。

作为一名三线后代，我出生较晚，1979年才降临于湘中腹地的一家三线工厂。随后，我和我的那些伙伴们无一例外地离开那里，如同蒲公英一般散落在这个国家的各处。起初我以为自己并不是特例，可后来才慢慢发现，很少有人拥有像我一样的经历。只有一次，在某个场合，我和另一名三线子弟非常愉悦地聊到了彼此的过去，随之而来的是不断附和“我也是这样的”、“天啊！我也是这样的”。随后我们在大无边的京城子夜各自散去，带着他乡遇故知的心态，沉入各自的睡梦，和回忆。

2010年，我担任总编导，和我的团队（编导：欧大明、钟亮、蓝凯）制作了一套十集纪录片《三线往事》。去往西南各地，历时三个月，采访数十人，我第一次知晓了我为什么会诞生在那里，而我的父母——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至今仍对那座荒野中的破败工厂念念不忘。

当《读库》约我写这样一篇稿件时，我将其视为某种神秘因子在作祟。我承载于斯——像是我出生那天起，这篇文章就在等着我，直至今天。

三线始末

1964年夏天，大诗人毛泽东准备收拾起“大跃进”的挫败感，带上几个文人，骑着马去寻找黄河源头。可随后突然爆发的越战改变了他的这一行程。

8月4日，美国人的驱逐舰与越南人的鱼雷艇在越南北部湾地区发生激战，越南人声称美国人袭击了他们，美国人则声称是越南佬先动手的。当然，根据三十多年后的解密，美国人承认是他们先干的。

越战就这样爆发了。战火很快烧到了广西边境。这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等人的警惕。他们从战火烽烟中夺取政权方不过十五年，硝烟尚未散尽，蒋介石仍旧在海峡对岸虎视眈眈。而1962年才刚爆发的中印战争，曾经的盟友——苏联站在了印度那边。在中国人看来，那个曾经的老大哥现如今早已资本主义复辟，边境状况极不稳定。唯一的问题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何时打开？

彼时的中国正准备开展第三个五年计划，在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及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等一系列问题后，国民经济陷入崩溃。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提出率先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即抓好农业问题、纺织工业问题、轻工业的问题。这一提法得到了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的赞赏。而毛泽东却突然提出“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的问题，两个拳头，即金属工业和国防工业，屁股则意指农业。“屁股坐不稳，拳头打不出。”尽管，毛泽东认为农业很重要，但两个拳头也不容小觑。

他随后提出了“三线建设”这一目标。我们目前已经很难确定毛泽东明确这一概念的具体时间，但1964年4月25日，解放军总参作战部曾提交过这样一份报告。报告中写道：我国主要的工业百分之七十以上都分布在沿海大中城市，这些城市人口稠密，而且主要交通干线也在这里，这几座大城市周边还有一些大的水库，一旦发生战争，疏散困难，工业将受到较大打击，水库决堤后也将淹没部分城市。这份报告理应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苏联不正是将重工业迁往高加索地区，才赢得了那场与纳粹德国的决战吗？前车之鉴，并不遥远。

几个月过去后，听着美国人在越南北部湾的隆隆炮声，毛泽东越觉得三线建设这事拖不得，也缓不得了。然而，对于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邓小平以及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刘少奇来说，国民经济仍旧是头等大事，随后他们适当吸收了毛泽东的意见，搞出了一个先抓好吃穿用问题再抓好三线建设问题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据不能被完全证实的说法：李富春在向毛泽东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听完问了一句：你那个国家计委挂不挂牌子？李富春说挂牌子。毛泽东问挂的什么牌子。李富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委员会啊。毛泽东说，我看不是，我看你们挂的是中央书记处计划委员会。

毛泽东的言外之意是：你们只听邓小平和刘少奇的，而不听我的。我说了这么多要抓好三线建设，你们还不听。

据说，在后来的会议上，便曝出毛泽东那些“搞攀枝花、搞成昆线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你们再不搞三线建设，我就骑着毛驴下西康”、“后方建不起来我睡不着觉”等充满感情色彩的话语。

国家计委随后改组。1965年，新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出台，正式提出全面重点抓好三线建设。事情全面扭转，毛泽东的坚持成为了现实。

具体的三线所指——将中国从地理上进行划分，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西部纵深地带为三线，即长城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西部地区是甘肃省乌鞘岭以东，东部就是京广铁路以西，涉及十三个省、自治区的全部或部分地区的，统称为三线区域。总的来看，三线建设的投资与项目建设重点均选择在西南。与此同时，各个省市还有根据自身情况而开展的“小三线”运动。

毛泽东确定了三线建设的总方针，即：靠山、分散、隐蔽。具体解释是：“大分散、小集中”，“依山傍水扎大营”。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

从1964年开始，在其后五年时间里，先后有包括核工业、航天航空工业、兵器工业、电子工业、船舶工业、综合科研和实验基地在内的三百八十多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从沿海地区迁往三线。包括能源、电子、光学、机械等行业的二百多个新建项目，从1965年开始在三线地区同时动工兴建。

根据当时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大方针，几乎所有的工厂、研究所都位于大山之中，交通闭塞，条件艰苦。在头三年中，三线建设者们需要先修路，据不完全统计，三年中共修建了二十五万公里的

公路。

1966年是三线建设的第一个高潮，当年度三线建设的年度计划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百分之四十二。在当时经济困顿的局面下，用将近一半的建设投资投入到三线建设中，由此可见中央的重视程度。

第一次建设高潮中遭遇“文化大革命”，三线建设遭到极大破坏，原定的计划大部分都没有完成。从1969年到1972年间，三线建设迎来了第二次高潮。如果说第一次三线建设是因越战引起，那么第二次三线建设的高潮便是因为中苏珍宝岛战役。两次三线建设高潮都是被动的，因受到战争威胁而发起。

第二次三线建设高潮先后修筑了贯通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湘黔等几条重要铁路；新建、扩建了攀枝花、包头、酒泉等大型钢铁基地和为国防服务的十个迁建、续建项目；在四川、贵州、甘肃等地建设了一批为国防服务的石油、机械、电力项目。这就使得西南三线战略大后方基地已初具规模。

1964年到1978年，整个大三线的建设，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两千零五十二亿元，共安排了两千多个建设项目。这两千多项目中，有民用的，也有军工的，从行业来说，有煤炭、电力、冶金、化工、基建、兵器、航空、航天、电子、船舶等，这些行业初步形成了一个后方战略基地。建设了一个新型的工业系统，搭建了新型的科研基地，科研基地研究所有四十五个，建设新型的工业城市如攀枝花市、六盘水市等，共有三十个。

第一批支援三线的科技人员、技术工人、管理干部，从沿海地区工业城市赶赴内地，成为这场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在远离中心城市的荒山野岭之中，第一次出现了人的踪迹，在荒僻、冷寂、亘古无人的所在，一个又一个三线企业在那里安营扎寨。

那是一个充满献身精神和革命理想的年代，共产党员、生产骨干积极响应，踊跃报名。华罗庚曾经感叹过：多去西南峥嵘地，少去江南鱼米乡，身生故乡非不爱，更爱三线炼人场。

在三线建设期间，江浙、上海等吴语地区人口数量在六千万左右，

而其中的十分之一在此期间迁往中西部参加三线建设。

自1965年起，全国四百万知识分子与技术骨干开始不断接到调令。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四百万的数字似乎并不算多，但在当时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这已经几乎是它大部分的精英了。

“三线建设”这样的字眼当时并未出现在这个国家的宣传机器上，它真正出现在《人民日报》，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了。人们当时习惯称呼它为“支援内地建设”。或者，什么都不说，索性保密。

随后，来自江苏的刘光武出发了，来自广西的李胜传出发了，来自上海的倪同正出发了，来自东北的王大保出发了，来自辽宁的韩国宾出发了，来自湖北的董家骥出发了……如果可能，我们愿意将这份名单一直书写下去，直至四百万知识分子及上千万家属，以及上亿被义务动员起来的民工们都为人所知。

他们的一生，从此改变。

如此规模庞大的人口迁徙，原本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切都变得简单起来。拍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三线人当年的行李中，有三样东西堪称标准配置：一是《毛主席语录》，这是当年的必备手册，万万少不得的；二是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这个一般是工厂领导、亲朋好友之间相互用来赠送的；第三件才是跟生活有关的物件，一个木制箱子。前者用来在精神上武装人，后者才是实实在在的用来搬家。物质尽管贫乏，但精神并不萎靡，由东向西，由北往南，一代人的青春，就此上路。

数十年过去后，故事晕染开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此事，开始讨论此事。人们议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是否值得，如此多的人命运被改变，又是否应该。毫无疑问，战争并未爆发，毛泽东当年是否太过多虑？

事实上，从目前解密的各类文件来看，当时的战争局面的确是一触即发。《蒋介石日记》中提到，美国人曾考虑向中国投掷原子弹，而蒋介石没有同意。美国人还曾考虑过让印度或者韩国动手，给他们以核武器，与中国爆发战争。当然，这一计划最终也没得到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的批准。

毛泽东对此曾说：原子弹是吓唬人的，既然是吓唬人的，就让它早响嘛。在“让它响”的同时，中国人开始做足准备工作。由此点看来，它不同于知识青年下乡，也不同于“文革”中的串联，它在历史之中有着“报效祖国”的确凿含义。

或许，在接下来的故事中，你会读到一些重复，重复的体验，重复的感受，重复的表态，看上去，他们就像是一个人。对，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那一代人看上去就是同一个人，无论生活，还是思想。

但，他们又都是有名有姓的活生生的人。

攀枝花的故事

攀枝花曾是一片只有七户人家的荒凉之地。当确定在此建立一座大型钢铁厂时，毛泽东曾询问这个地方叫什么。周恩来说，那里暂时还没有名字，只是漫山遍野开满了木棉花。毛泽东说，哦，那就叫它攀枝花吧。

木棉花，又名攀枝花。

攀枝花是一座完全依赖三线建设兴起的城市，它的历史，就是三线建设的历史。

董家骥

1965年，三十二岁的董家骥从武汉钢铁厂被抽调来支援建设攀枝花。

当时从武钢与他一同调过来的有一百多人，“基本上老婆孩子都丢在武汉”。“那时候年轻，有一个很朴实的、很忠实的思想，就想来参加祖国的建设。国家需要，党的需要，没说的。”

作为第一批参与建设攀枝花的人，董家骥担任的是勘探的任务。对于当时的攀枝花，勘探队员们直言有“五怕”：一怕麻风，二怕狼，三怕横渡金沙江，四怕地震塌了房，五怕坏人打黑枪。当时攀枝花附近曾有一个麻风村，对麻风病的不了解导致大家畏之如虎狼。而真正的狼

群，则每晚在他们的帐篷或是干打垒（用土做墙，用茅草做房顶的临时性住处）的四周游弋，嚎叫不休。交通的不便使得他们经常要坐小船横渡金沙江，金沙江水流湍急，礁石众多，每次横渡无异于一场生命的冒险。“坐小船过江，一毛钱一张票，拿回去报销。就靠那种小毛船过江。”

而当地正位于地震带，地震塌房于他们而言，并非一件多么遥远的事情。所谓坏人打黑枪，则是由于当地解放不久，“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还有不少，还有什么民族矛盾，对不对？有坏人打黑枪。所以那个时候，这么‘五怕’思想。”

“没啥吃的，老百姓总共才七户人家，每天就是土豆、粉条。”令董家骥记忆深刻的是当时的干群关系，“我们那个支部书记、队长、副队长，住在猪圈里头，那个地方最脏、最潮湿，队长、支部书记先住。然后班长、党员也都在那个环境最差的地方，其他的同志条件好一点。那个时候我们的党员都是不错的。所以我现在很怀念他们，很想他们。”

守着金沙江，喝水却是一件难事。打一桶水上来，用明矾沉淀干净，早上洗脸，中午擦身子，晚上洗脚，完了不能倒，还要和泥用。

后来，勘探结束后，他们被留了下来，董家骥的老婆孩子也来到了攀枝花，四口之家住在一间十五平方米房子里，上下铺，房子是木板拼凑的。“当年我们的口号是：不想爹来不想妈，一心建设攀枝花，不出铁不回家。那个时候职工的思想、心情啊，就想到为国家分忧，为党分忧，为毛主席分忧，要尽快地把攀枝花建设起来，你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都睡不好觉，我们还能睡好觉吗？”

沈忠凡

沈忠凡三十三岁那年到的攀枝花，那是1965年。他是高炉设计员，后来是全国劳模，受到过华国锋的接见。

“当时我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第一，我家解放前是农民，解放后土地分到自家，那个求之不得。第二，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培养成为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作，恨不得到现场去锻炼自己，成长

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心情。”当时在重庆钢铁设计院担任设计师的沈忠凡接到这份任务，感到无上光荣，立即和同院的十几名设计师，乘坐敞篷车从昆明抵达了攀枝花。

其实，他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了。早在1958年，一切就已经开始进行。当时中央在西昌与攀枝花两地进行选择，钢铁厂究竟建在哪里，始终拿不定主意。作为设计师，沈忠凡曾分别深入过这两地进行考察，当时的对比是，西昌的地震级别比攀枝花要高一级，但水资源也没有攀枝花丰富，攀枝花守着金沙江，用水较有保障。地震级别西昌是八级设防，即八级设计九级设防。而攀枝花是七级设计八级设防。尽管只是一级的差别，然而投资额度的区别却是非常大的。关于矿区，攀枝花市区周边有三个大矿区，西昌则只有一个。可攀枝花的致命问题是四处都找不到一块平地，将整个厂区建在陡峭且坡度起伏的地方是否合适？是否真的“弄弄”就能“平”了？

据说这个地址的选取一度让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颇费周折，他们实地察看了十几处可能的厂址，都觉得平地面积太小，建一个这么大规模的钢铁厂不太可能。一次，视察中的李富春给周恩来去了个电话，汇报新发现位于攀枝花西部的一处长三公里、宽一公里，落差却有八十米的小山坡。如此地势，按理说建一个钢铁厂也颇具难度，然而，电话那边的周恩来却很乐观地说：“弄一弄就平了嘛。”“弄弄坪”的大名，由此得来。

在勘探队员将两边的情况向中央汇报后，事情一度停滞下来。直到毛泽东1964年决心发动三线建设之后，1965年，中央正式批示，将钢铁厂最终确定建在攀枝花。

“来的时候就是荒无人烟，只有现在的焦化厂旁边有一个小生产队，大概有三五户人的。礼拜天，我们经常要到农民家去访贫问苦，给他们理发，跟农民关系处理得相当好。农民们都很穷，不是一般的穷。说得不好听的，那女孩十五六岁都没有裤子穿。我们去了过后她到地下去坐。我们去了过后就很多小孩就围过来。那些小孩全是裸体。那些小孩，两头小中间大，小孩那个肚子都很大，黄皮寡瘦的，看着很稀奇。当时就是这个条件。”

沈忠凡的工作是这么安排的，白天做干打垒，晚上搞设计。“我们年轻人主要是白天做干打垒，晚上要搞设计。土板架子自己钉，凳子也是自己做，床也是自己安装。吃嘛，大米是有的，灰面是有的，但是菜就是粉条、海带。每个月两斤咸肉。气候特别干燥，鼻子经常流血，所以我们出去过后都是每个人草帽一顶，水壶一个，还有解放军战士那种帆布口袋一个。如果到现场还要杵根棒棒，打狼，顺便做拐杖探路。”沈忠凡回想起来，也很惊讶自己当时怎么会有那么旺盛的精力。白天干一天活，晚上搞设计能搞到十二点，中午从不休息。“我那时候身体也好，又雄心壮志，干得很好。”

一百多人的设计队伍在修了十几座干打垒后，开始在周围种上芭蕉树，并开荒种菜。他们意外发现西红柿、茄子、黄瓜这些蔬菜长得相当好，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开始自给自足，并开辟了一个能满足两百多人需要的菜园子。“来了过后，把住的吃的解决了，都努力要搞好这个工作，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凭中国人民的智慧才智，怎样把它搞好。”

沈忠凡所说的“智慧才智”并不单指在种菜方面，而是高炉设计上的自主研发。当时全国只有首钢有五十吨的转炉，而他们的目标则是一百二十吨。他们最终达到了这个目标，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能力。这是一个奇迹，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一百二十吨的转炉仍然在使用。

另一个设计难度是，攀枝花的地形地貌坡度特别大，在那样一个地方建设一家年产五百万吨产量的钢铁厂，作为设计人员来说，难度可想而知。“那个坡度特别大。有三十八度到四十五度之间。但是我们分了大小三十八个台阶。公共设施又分了若干个台阶。那么主厂区的运输就靠铁路机车运输。其他的运输靠皮带运输，吊车车子运输，或汽车运输。我举个例子，钢水来了过后，要到炼铸车间去浇成炼铸坯。这个高度落差九米，那我们就用吊车垂直运输，把钢水从那个台阶运到上面一个台阶。所以这个地方的总体设计、总体布置占地面积在全国来说是最少。中央领导也好，各个市里领导也好，流传着说这里是象牙微雕。”

1970年7月1日，攀钢第一次出铁，沈忠凡作为设计人员，戴上大红

花，站在了表彰大会的前台。这时他的妻子和孩子还在老家农村。直至十年后，也就是1980年，他们全家才在攀枝花团圆。

回顾往事，沈忠凡认为自己是“献了青春献终生”。他感到“光荣，值得”，并未觉得什么遗憾。他只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时间和心思照顾自己的子女，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当普通工人，一个当农民。

他已经快八十岁了，有时还在给攀钢的设计院搞点设计，用他的话说“敲点边鼓”，甚至有时还去现场看看，搞搞勘探。至于生活，他说现在大不一样了，每顿饭的伙食标准是十五块钱，早餐有稀饭、鸡蛋、馒头，中午要荤菜有荤菜，要素菜有素菜。“多好啊。”他最后说。

刘胜利

1965年大部队开进攀枝花进行生产大会战时，刘胜利才十四岁。他的家乡离攀枝花不远，坐在家门口就能看见浩浩荡荡的车队往攀枝花方向开去。那个画面给了他很深的印象。“我亲眼所见，汽车一辆接一辆，车辆不断，日日夜夜地向攀枝花奔过来，一辆接一辆的，灰尘铺天盖地的，一天下来，浑身的土，只有两个眼珠和牙齿还能够看清。”

刘胜利当时看见的“日夜奔流”的车队，是由国务院组织成立的五大汽车公司，由辽宁、北京、山东、河南、安徽分别组建，共有一千五百多辆汽车，从成都往攀枝花运送人员及器材。由于条件所限，大量器材最后上山仍旧需要建设者们肩扛手提，因此就有了“白天杠杠压，晚上压杠杠”的说法：白天用木棍挑着器材上山，到了晚上，则将木棍拼凑在一起，当作床板睡觉、

少年时的刘胜利目睹了许多令他记忆犹新的画面。他记得那些建设者们居住的房子会滴油，太阳毒辣时，顶棚的油毛毡被晒化了，油便一滴一滴地滴下来。他还记得那些建设者们用杠杠抬着机器上山时喊的号子——小路巴掌宽，机器要上山，怎么办？一声喊！抬上肩！

刘胜利对自己的初中时光还记得两件事。一件是每到周末，学校就组织学生们去拥军，所谓拥军就是去参加铁路上的义务劳动，帮助铁道兵锤石渣。第二件则是参加铁道兵的追悼会，他亲眼看见一些铁道兵牺牲在建设工地上，他们去参加这些烈士们的追悼会。

中学毕业后，政审合格，他便进了向往已久的攀枝花钢铁厂工作。

高建桥

1966年，十一岁的高建桥和父母一起从黑龙江来到攀枝花。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

路途如此遥远。坐火车从黑龙江到北京，从北京到成都，再从成都坐汽车到攀枝花。高的父亲是一位领导干部，此次前来，是担任攀枝花三线建设的某个领导职务。

高建桥还记得自己在攀枝花吃的第一顿饭，是交通指挥部负责接待的。两个菜，一个是榨菜，一个是由鸡蛋粉做成的炒鸡蛋。高建桥还觉得很好吃。南方的山水吸引了他。十一岁的男孩野得很，离开家，离开熟悉的环境，去到哪里都会是兴奋的。

攀枝花当时全是席棚子，大工地。所谓的百货公司只不过是一个小卖部。当时的职工是不允许带孩子的，高建桥作为领导干部的子女，被特殊批准跟着来看看。

高建桥是四兄弟，父亲奉命调到攀枝花来时，担心条件艰苦，将两个孩子留在了北京的战友家，只带了高建桥和另一个孩子过来。再加上另一位领导也带了一个男孩过来，整个工地上就只有三四个孩子。四周全是山，也没有房子，只是干打垒。在高的回忆中，他们几个孩子在山上、工地上到处跑，就连职工们提醒他们注意有狼，也未放在心上。

逮蝻蝻儿，或者在坝子上看看露天电影。再后来，因为工地的事务太多，条件也着实艰苦，按照先生产再生活的原则，领导干部家属被安置在了离攀枝花七八十公里的会理县。

高建桥永远都记得，有一次父亲回来，一反常态穿了件长袖衣，脸上的表情却依然是快活的。吃饭时，他看见父亲夹菜露出了胳膊，胳膊上全都是一道一道勒得很深的印子。

高建桥没有向父亲询问什么。他下意识地感觉到那可能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后来他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同样席卷到了正在建设中的攀枝花。父亲作为刚从部队下来的领导干部，整天遭到批斗，批斗完后还要继续工作。那些印子全部是用铁丝勒的。“坐土飞机，勒的

全是印子。然后他怕我妈妈和我们看到，然后就拿长袖衣服盖起来。当然他也遮不住。”

会理县出现了武斗，攀枝花也有。在高建桥的记忆中，有些人拿着钢钎、铁锤，戴着藤帽，在工地上一群一群地经过。而会理县则时常会听见枪声。

高建桥和新结识的伙伴，滚着铁环在路上走。他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只是知道母亲越来越紧张，而父亲则越来越难看见。有时几个少年会找机会爬那些解放牌老式四吨卡车，车开得慢时，他们从后面一蹿而上，爬到那些拉沙石的车上，又或者，就那么吊在车尾，在南方的山山水水中吊一路。有些司机会让他上驾驶室来坐坐，有的司机可能就会发脾气，把他们赶走。

四十多年后的高建桥回忆起来，却觉得“那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只要能坐上车，就很快乐”。如此漫长的岁月过来后，高建桥就说了这些。父亲的伤，和自己少年时无聊的快乐。

韩国宾

1968年10月，鞍山钢铁公司化工总厂的革委会主任韩国宾正在北京开会。本来开完会就可以走了，结果听说毛主席要接见他们，便一直等着。

等待过程中，一纸调令，将韩国宾从鞍山钢铁公司调往了攀枝花。

韩国宾接到调令后一直没动身，想等毛主席接见完后再走，结果一等等了三个月。1969年的1月25日，毛主席才接见了他们。接见完后，他便匆匆忙忙赶往攀枝花。

韩国宾十八岁进鞍钢，三十八岁去攀枝花，可谓人到中年，从头再来。

从鞍山到武汉，至桂林，经柳州，再往昆明，昆明坐汽车又坐了三天，路上就足足走了半个多月。他心里琢磨着，这会是个什么地方呢？出发前领导和他说了条件艰苦，他想再艰苦能艰苦到哪去呢。那个年代的人，越是艰苦便似乎越是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住的是干打垒，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还能听见鬼哭狼嚎的声音，